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7/705

S/15513

9 December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61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七年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
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982年12月7日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根据1982年6月24日史蒂纳·贝尔格医生和幼儿保健员欧文德·摩勒在挪威外交部会议的发言写成的报告。

两位挪威医师的证辞已说明得很清楚。这是一篇记述以色列部队对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公民如何进行野蛮行为的可怖的报告。

请阁下将随函附上的报告作为大会（议程项目61）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使

哈泽姆·努赛贝（签名）

附件

1982年6月6日挪威外交部的照会

附上的报告(见附录)是根据1982年6月24日凌晨4至7时史蒂纳·贝尔格医生和幼儿保健员欧文德·摩勒在挪威外交部会议的发言写成的。上述两位人士均为挪威驻赛伊达的巴勒斯坦阵线医疗队成员。

该队是依据挪威巴勒斯坦阵线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一项协定前往进行工作的。

外交部出席会议的人士有:

- (1) 区域顾问汉斯·维赫伦·朗瓦
- (2) 办公室主任/助理秘书, 贝加伦·林德史东
- (3) 首席顾问拉斯·温瑟尔
- (4) 首席顾问彼得·雷德尔
- (5) 见习生史蒂芬·康格斯塔

下列巴勒斯坦阵线的医疗队成员也出席了会议

- (1) 马丽安妮·摩勒
- (2) 里弗·柏里特·贝勒德比
- (3) 柏里特·费克斯达尔

外交部1982年6月24日的会议目的是听取贝尔格医生和幼儿保健员摩勒讲述他们在1982年6月13日被捕情况和两人从6月13日到20日被以色列扣押期间的整个经历,以及他们在被扣押期间目击难友所受待遇的报告。

会议是外交部提议举行的。会议经过全部录音,本报告基本上根据录音带整理写成。外交部整理的报告已经由贝尔格医生和幼儿保健员摩勒审阅和首肯。他们并在报告后签名,肯定其内容正确叙述了他们的经历。

外交部

汉斯·维赫伦·朗瓦

* * *

挪威文的英译是“非正式”的，由巴勒斯坦阵线仓促译成，因此英译本如有任何不确之处，概由巴勒斯坦阵线负责，外交部不负此责任。

附 录

报 告

1. 史蒂纳·贝尔格医生和幼儿保健员欧文德·摩勒的被捕经过

贝尔格和摩勒是在通往赛伊达海滩的街道边一个以色列哨所被捕的。他们在那个哨所接受护照检查，经过哨所的人的护照都盖了章。贝尔格和摩勒认为，这个图章代表执照人受到以色列的承认，盖过章即表示在某一区域可以自由活动。

贝尔格和摩勒于6月12日在哨所出示护照并获得通过。贝尔格的护照和红新月会身份证上都盖了章，摩勒则在他的手臂上盖了章。第二天早晨摩勒改在护照和红新月会身份证上盖了章。

6月13日，贝尔格和摩勒再次到了这个哨所，同他们一道去的一名加拿大医生和一名巴勒斯坦医生在前一天，即6月12日未被哨所认可。贝尔格和摩勒陪同这两名医师于6月13日到哨所去是为了看是否会被捕。医院的其他巴勒斯坦人员都已经被捕了，包括麻醉医师—因此如果加拿大籍外科医师也被捕，他们就非关闭医院不可。贝尔格和摩勒两人前一天均曾通过检查站且前一天已获盖章，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被承认或认可，已经得到盖章后应享的活动自由。

检查站规定的办法是，人们必须通过街道两边的一个又一个哨所。两个哨所之间停了三部汽车，车内坐着蒙面的告发人，由他们指出应逮捕谁。贝尔格和摩勒不知道这些告发人的身份，当他们同加拿大和巴勒斯坦医师一道通过这两个哨所时，贝尔格和摩勒被自称为以色列士兵的人逮捕了。逮捕时未让贝尔格和摩勒有机会说出他们自己的身份或进行任何解释。贝尔格和摩勒认为，逮捕他们的人员不一定知道逮捕了两名医务人员。

贝尔格和摩勒被捕后被送往一所学校，被捕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他们到学校后约五分钟，也就是被捕后约15分钟，两人得到透露自己的身份的机会。他们

出示了自己的有效的挪威护照和有效的黎巴嫩入境签证，有效的黎巴嫩身份证，清楚表明他们获得黎巴嫩有效的居留权和工作许可证，并有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出的身份证，清楚证明他们是民间医疗人员。这些身份证是白色的，上面“标明”了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徽章，并贴着持有人的照片和盖了红新月会的图章。摩勒的身份证在被监禁时即被收走，但贝尔格的身份证仍随身保留，并在外交部会议时拿出来给大家看。

除了在被捕后约15分钟两人说明了自己的医务人员身份以外，贝尔格和摩勒均认为，当天下午在拘留地点，以色列驻赛伊达的最高级军官，一个名叫阿尔隆·摩哲的人认得他们。

贝尔格和摩勒在6月12日曾在哨所见过阿尔隆·摩哲上校。他们当时曾向他申诉，说明了从6月11日起医院90%的男性工作人员被捕后的困难情况，特别是“缺乏”麻醉医师，因为许多手术必须立即进行。6月12日会见了摩哲上校后，双方又同意于6月13日上午10时与摩哲会面。贝尔格与摩勒在摩哲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直到中午12时，他们出席了赛伊达平民医务人员会议，讨论在该镇进一步组织卫生护理工作。会议由一名以色列医师（自称是心理医师）主持。对街的红新月会医院却并未列名在这张合作医院的名单上，贝尔格事后认为他们以代表身份出席这次会议是以色列方面的错。贝尔格和摩勒是在开会出来后马上被捕的。同日下午摩哲见到贝尔格和摩勒时，他们已成为阶下囚。虽然贝尔格和摩勒没有同摩哲交谈过一句话，但两人毫不怀疑摩哲是认得他们的，摩哲当时站在离摩勒的两米远的地方，两人四目相视。

贝尔格和摩勒被捕和拘禁后没有得到以色列主管官员给予任何理由。当摩勒被捕后询问拘捕理由时，以色列主管官员只说：“我们想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另一方面，贝尔格和摩勒心目中认为是囚犯警卫的士兵则指他们两人为“巴德尔—梅胡夫帮”，是“凶手”，指他们“为凶手工作”，“协助藏匿巴解组织人员”。

欧文德·摩勒的妻子马丽安妮·摩勒说，她提出询问时，阿尔隆·摩哲上校告诉她，欧文德·摩勒被捕的理由是因为“他协助巴解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逃出医院。”阿尔隆·摩哲不愿告诉摩勒太太关于史蒂纳·贝尔格的情况。欧文德·摩勒说，他在被监禁期间没有听到任何象摩哲对他太太所说的那种指控。摩勒夫妇均强调表示，这种指控是不确切的，由于以色列的管制严密，任何人根本不可能把以色列要追查的人弄出医院去。

2. 史蒂纳·贝尔格和欧文德·摩勒被以色列扣押期间的待遇。

6月13日，贝尔格和摩勒被捕后即立即被送往赛伊达的一间学校校园，他们在那里关了36小时。6月15日早晨，他们被送往赛伊达以南2至3公里处，设在沙法尔柑橘公司(Safar Citrus Corporation)的另一座集中营。第二天，即6月16日，他们再被送往以色列的马吉多监狱。6月20日晚他们获释，并被送往特拉维夫的挪威大使馆。

摩勒在被逮捕后不久，衬衫背后即被印上红十字和一个新月形的记号。贝尔格的衬衫背后是一些黑色希伯来字。所有囚犯都印上标志。贝尔格和摩勒不知道这些标志的意思，也不知道戴有不同标记的囚犯是否受到不同的待遇。

他们到达从前在赛伊达做实习医师任职的学校时，先被送到一个小操场，后来又送到附近的一个较大的操场，在小操场时，他们必须跪在地上，双手反绑。他们不记得在那里坐的时候是否必须低着头。

他们在小操场时可以听到从附近大操场处传来的叫声，“痛楚的嘶喊”。他们还听到从大操场传来的枪响，但不知道放炮是为了威吓或是真的向人射击。

随后，他们自己也被送到大操场，到那里以后他们被迫双膝跪下，双手反绑，头朝下低。稍后，他们的双手换成前绑，警卫准许他们“向上张望”，未作任何反应。他们必须以这种姿势跪在那里，连续36小时不准移动。白天跪在烈日下，挨受烈日的炙热，夜间气温很低。

操场四周围着几部装甲车，运兵车上面都装了重机枪，枪口对准囚犯，包围了操场。

他们在被扣押期间虽然有几次被警棍和其他物件轻轻打过，但并未受过肉体的刑罚。但以色列士兵们在殴打其他囚犯时，好几次似乎也想打贝尔格和摩勒，但并未真的打过。其后，他们受到以色列人的威吓，但没有受过肉体的虐待。以色列士女曾用过粗暴的语言。贝尔格和摩勒的印象是，虽然有几个士兵想打他们，其他的士兵上前阻止，使他们没有受到肉体的虐待。关于这一点，马丽安妮·摩勒表示，有一个以色列士兵告诉她说，她丈夫两天前已被送往以色列。该士兵说：“我力求他们受到适当的待遇。”他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肯进一步说明何谓“适当的待遇”。除了这种情况外，欧文德·摩勒记得他曾向审查他的人要求，请他派人告诉他的妻子，他已被送到以色列去了——这是当时主持审问的人答应作到的。

贝尔格和摩勒被捕后当天晚上第一次得到食物一面包和水。后来，他们又获得食物和水方面的“特别”待遇。他们比其他囚犯先得到食物和水且得到的较多。

贝尔格和摩勒在受审讯时也受到合适的待遇。6月14日下午审讯时，贝尔格受命检查一具放在室外的尸体。他认为这是为了检查他是否真的是一名医师。贝尔格检查的那具尸体旁边，一部汽车（客货两用型）上还躺着56具尸体。审查官告诉贝尔格和摩勒，他认为可以释放他们了，但实际并未立即释放他们。

贝尔格和摩勒在萨法尔在集中营内也受到合适的待遇。在前往以色列的大汽车上，贝尔格和摩勒受到了较优的待遇。其他的囚犯须坐在车后部，双手反绑，眼睛蒙住，而贝尔格和摩勒则坐在车前部，未蒙眼睛，也未被绑住。

贝尔格和摩勒在以色列马吉多监狱时，必须在他们所谓的“审问房”上躺48小时。这段期间，两人都须戴手铐，蒙眼。但他们仍较其他囚犯的待遇为佳，与

其他囚犯不同的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躺在睡垫上。他们获准在睡垫上直坐。在这段时间，贝尔格和摩勒可以听到在审问房的其他囚犯挨打的声音。有一次有人向贝尔格和摩勒投石子。其他时候贝尔格和摩勒在监狱里所获的待遇还算好。他们在狱中行走时都蒙了眼，另外戴了手铐或脚镣。

3. 贝尔格和摩勒目击囚犯受虐待的报告

据贝尔格和摩勒说，在赛伊达学校大操场上，囚犯受到很多暴力待遇。贝尔格和摩勒估计，操场上的囚犯为数约500至600人，他们估计约有一半人遭到肉体的暴力，即被敲击和殴打。

敲击用的武器有从桌上撤下粗大结实的桌腿，有圆有方。也有使用长棍，象警棍而带有弹性的。这些棍子可长达一米，约两公分粗。长的坚硬的塑料管，象花园浇水用的皮管，被用来打人。粗绳子，绳端有结，也被用来打人。摩勒有一次看到使用这种绳子上面结着铁片来打人。另一次他看到在木棍或桌腿上面钉了铁钉被用来打人。士兵会使用五条，六条或七条塑料皮常绑在一起当作鞭子。俘虏常常挨拳头或枪托的殴打，或被军靴猛踢。他们并在俘虏头顶向空开枪射击。

暴力的程度虽有不同，但整天都在使用暴力。每天早晨是暴力较少的时刻，但随后即越来越多。白天使用暴力从不停止，直到晚上俘虏入睡为止。夜间没有暴力。

暴力使用的情况是，将小股囚犯从操场外沿带走，士兵分成两三组或四组，用上述的各种工具殴打俘虏。俘虏身上多在腹部、胸部、双肩和头部被打击，偶而有时会被打到阴部，需视当时俘虏的坐姿而定。俘虏个人受到暴力的程度因人而异。

贝尔格和摩勒强调的另一点是，用来绑住俘虏双手的塑料皮带是偏平而边缘锋利的，使被绑的人受到痛楚。两人后来看到许多俘虏被这种皮带造成伤害。贝

尔格和摩勒有一两次看到几个好心的以色列士兵因俘虏称痛而用刀除去绑手的塑料皮带。他们也曾见到士兵因俘虏称痛而把皮带绑得更紧。

贝尔格和摩勒表示，在赛伊达学校见到的虐待情况有属于非常严重的，他们对此作了特别的报导。

摩勒在校园的第一天曾见到一群俘虏被带进来。他不能确定人数，但至少有五个人以上。他们都是双手被反绑，眼睛蒙了眼罩。他们到了校园后站在摩勒身边站成一行。一名肥胖 着红色臂章的以色列士兵面朝俘虏立定。然后一个接一个的以色列兵用尽全力以膝头撞击俘虏的阴部。当俘虏受痛向前扑倒时，这些以色列士兵即朝他的颈项打击，当俘虏倒在地上，士兵即上去踢他的面和腹部。俘虏们随即被聚在一处，都因疼痛而弯着腰。他们并未失去知觉。

另一件事是，一个老人，贝尔格和摩勒估计他约有60岁左右，显然因绝望而站立起来朝一名以色列士兵踢去。四到五名以色列士兵立即扑向这名双手反绑眼睛未蒙眼罩的老人，并不断用木棍和棒子殴打他。他全身没有一处未受到打击；头顶，后脑，面部，腹部，双肩和两臂和阴部。他们不断殴打他一段时间。摩勒没有估计时间，贝尔格认为至少打了他约十分钟。那老人躺在地上象死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他的两腕和两足踝绑在一道，让他躺在原地。贝尔格和摩勒均未曾见到他被抬走。后来，当摩勒在等待受审问时，看到这人和另外三人躺在审问室窗外的地上，离摩勒站的地方最多只有六米远。

第二天，贝尔格和摩勒在赛伊达学校，他们看到一名原先在红新月会医院时的同事医生，贝尔格在以色列入侵前即在这所医院工作。名叫纳贝尔的这名医生来自西岸（约旦被占领区），曾在巴塞隆纳大学就学。纳贝尔医生在红新月会门诊所负责防治工作。贝尔格和摩勒在校园见到他时，他的颈上绑了绳索，被几个以色列士兵来回拖动，另几个士兵正用棍子打他。一天以后，贝尔格和摩勒在赛伊达南部集中营见到他时，他坐着，双眼发直视若不见，颈项和背部满是巨大的伤口。

赛伊达学校操场的两端耸立有兰球网的杆子和其他贝尔格和摩勒认为是用作手球标杆或悬挂的杆子。俘虏们通常即被绑在这些杆子上殴打。有时俘虏们被吊在杆子上。

贝尔格和摩勒又指出，赛伊达学校操场的俘虏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水，特别是操场中央的俘虏。每当士兵携水去，俘虏即“拼命”站起来讨水喝。士兵分给他们一些水以后即把其余的水泼在他们脸上。然后士兵们殴打俘虏，要他们坐回原地，一直到他们坐好以后还不停地殴打。其后，他们在他们头顶上向空开枪。这样作了好几次。在赛伊达南部的集中营，贝尔格曾与一名受苦的俘虏谈话，据他说他已经三天没有得到水喝了。

贝尔格又指出，赛伊达校园的许多俘虏受了轻伤需要治疗，但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贝尔格和摩勒的印象是，他们在赛伊达学校操场见到对俘虏的虐待是出于士兵自发的行为，而非受到军官的命令。另一方面，他们的印象是，军官并不在意校园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军官一直在场，显然在考虑当时的情况，但没有作任何干涉。

贝尔格和摩勒表示，赛伊达校园轮流看守的士兵约30到40人。夜班的一组人较白天一组“好”，夜间没有虐待的事发生。贝尔格和摩勒又强调，小部份士兵保持被动，没有参加虐待俘虏。这些士兵在当时的情况下尽他们可能地善待俘虏，予人一种不插手的印象。

大部份士兵或多或少地参加了虐待的行动。有一名士兵特别恶劣，他告诉贝尔格和摩勒他在奥斯陆有很多朋友，他来自以色列的一个集体农庄，那里的喀秋莎火箭曾杀死过一名奥国少女。这名士兵也曾参加虐待那名老人。贝尔格和摩勒相信那名老人已因遭受虐待而死亡。这名士兵是卷发，项上带着一串珍珠项链。贝尔格和摩勒说，他们仍可认出这名士兵和其他几个虐待俘虏的士兵。

贝尔格和摩勒说，赛伊达南部的萨发尔集中营较赛伊达学校操场的暴力为少。赛伊达南部集中营里对犯人有个别的暴力的例子，但不是有系统的暴力。在这边的集中营内，有两名以色列医师给予某些俘虏以医药治疗。俘虏们也是双手反绑安静地坐在地上。在集中营内的士兵也拿着棍子和棒子，但表现较好，贝尔格和摩勒没有看到他们象在赛伊达校园那样用这些棍子打人。

但贝尔格和摩勒在集中营也有看到几件暴力事件。有一次他们看到那些双臂高举直立的俘虏们，只要两臂一下垂就被殴打。另一次他们看到一个眼蒙眼罩双手反绑的俘虏被扔到地上，腹部、阴部和臀部不断遭到木棒的殴打。他被连续打了约3到4分钟，其后因痛苦而喊叫了许久。贝尔格和摩勒看到的第三个虐待的例子是一名俘虏被殴打了很久，直到一名认识他的黎巴嫩俘虏告诉士兵，这名挨打的俘虏是一名疯子。

在前往赛伊达南部集中营和以色列的大车上，全部俘虏上车以前都挨了大木棍的殴打。贝尔格和摩勒看到这种情况是每次车子出发时都发生的。

开车往以色列途中，除贝尔格和摩勒以及另一名加拿大外科医生，克利斯·吉阿努以外，全部俘虏都是双手反绑，眼戴眼罩。他们三人坐车厢前面，手未被绑也没有带眼罩。车上除驾驶员外，有两名士兵；都带着半自动枪和棍子。大车前后各有一部小车护送。车上的士兵不断敲打俘虏的头部和身体。有一次一名士兵还用伞打俘虏。车子在路上停了几次，贝尔格和摩勒猜想可能是以色列集体农庄。有一两次，车停时上来一些士兵和穿平民服装的人来“视看犯人”。这些上来的人有一两次也打俘虏。

贝尔格和摩勒到达以色列马吉多监狱时都蒙了眼罩。贝尔格在蒙上眼罩前看到有7或8名拿木棍的士兵。贝尔格和摩勒并未与其他犯人在同一地方下车。当车上剩下的犯人下车时，贝尔格和摩勒双眼被蒙住，听到犯人挨揍的声音，他们听到揍人，惨叫和其后的呻吟的声音。然后俘虏们沿着车子走过，距离不超过一米远。

在马吉多监获审问时，贝尔格和摩勒在狱中留了48小时，他们听到几种声音朝一名俘虏喊叫，然后又听到这名俘虏被殴打。贝尔格和摩勒在马吉多监狱的审问室中都看到木棍。摩勒在第二次审查时听到邻室传来清楚的打人和痛苦的嚎叫声。另一次，他们听到一个人被殴打的声音。一个早晨他们听到重复的同样的声音。这几次他们两人都是蒙了眼罩的。

4. 其他问题

在回答关于对犯人或使用暴力的问题时，贝尔格和摩勒的答复是，所有俘虏似乎都受到暴力。他们曾经看到俘虏被打到血流满面，也看到俘虏的脸上的伤口。他们在狱里遇见好几名俘虏都让他们检视到伤痕。大部分俘虏穿着衬衫和长裤，因此可能有暴力留下的伤痕也看不到。例外的情况是纳贝尔医生。前文已经提到过他的受伤的情况。

作为一名医生，贝尔格不能确定他在监禁期间看到的那些死者的死因为何，但他认为，很象是死于殴打和不同程度的中暑和脱水综合的结果。某些死者可能死于被捕前的伤势持续恶化，且没有得到任何医治的结果。

贝尔格和摩勒在问到关于他们的报告中是否也可能有错误时答复说，他们对当时发生的那些事可能记忆得不够完整，因此所作的报告并不完全，或细节不够，特别是关于暴力受伤的情况。另一方面，贝尔格和摩勒深信他们的报告是正确反映了事实的。

● 贝尔格和摩勒没有提到被俘期间在以色列军官面前看到的任何暴力的实例。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说出来会对他们产生后果。他们怕以色列会因此而觉得他们看到了太多真相。

贝尔格和摩勒在6月20日被释放后，立即向特拉维夫的挪威大使第一次提到

使用暴力的事。从6月20日晚到6月21日早晨,贝尔格和摩勒留在特拉维夫挪威大使馆时,也对挪威红十字会主席,毕若恩·埃格先生提到使用暴力的事。

史蒂纳·贝尔格 欧文德·摩勒 马丽安妮·赫勒·摩勒
